

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转型与文艺制度建构

郭国昌, 谢腾飞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文学批评是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基本路径之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分界线, 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从前期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本解读, 到后期的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准的政策阐释。正是在延安文学批评话语的体制性转型过程中, 文学批评才得以成为延安文艺制度的建构力量。延安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过程, 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实践中探寻人民性的必然结果。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之间, 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传导机制。人民性也正是作为一种美学意识形态在这种机制中被建构起来。

关键词: 延安时期; 文学批评; 人民性; 意识形态; 文艺制度

中图分类号: I2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2-0182-09

新世纪开始以来, 延安文学因其独特的人民性内涵和特有的现实关怀意识而再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作为历史形态的延安文学一直存活在当下的文学实践中, 而文学批评又作为文艺制度建构的基本路径阐释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作为延安文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是延安文艺走向体制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不是单纯的对文学文本展开的审美价值判断, 而是延安文化政治场域中的意识形态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批评在延安文艺制度的形成中与文学创作构成了主导性的互动关系。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讲话》提出的文学批评标准随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文化领导工作者与文学批评活动者管理文艺活动和展开文学实践的行为准则。而作为延安文艺意识形态传导机制的文学批评就从前期的“民族性与人民

性”同构的多元化、泛组织化状态逐渐转变为后期的以鲜明的“人民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主潮。随着以“人民性”为核心的美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延安文艺制度走向了成熟, 并且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文艺制度建构的雏形。

一、“泛审美化”: 延安前期文学批评的“准体制性”

1937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各机关陆续进驻延安, 拉开了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为特殊的一段文学史序幕, 延安文学的发展就此慢慢展开, 并以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的《讲话》的发表为分界点, 形成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延安文艺及其文学批评的发生与发展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以全国为普遍图景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也深刻影响与主

收稿日期: 2022-09-21; 修回日期: 2022-12-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解放区文工团文献整理与研究”(17BZW020)

作者简介: 郭国昌, 男, 甘肃静宁人,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解放区文学, 联系邮箱: gguochang@163.com; 谢腾飞, 男, 甘肃酒泉人,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导了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内在秩序与外在形态。“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公开领导, 主要通过文艺批评发挥作用。”^[1]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文学批评虽然不如《讲话》发生后那般具备强大的规训与引导能力, 但从宏观的历史进程来看, 延安文学批评的两个发展阶段是具备着“同一性”的。也就是说, 两个阶段的文学发展都是为抗战、革命大局服务的, 并不能对其作出泾渭分明的学术区分, 只能在文学批评形态的差异性中寻求历史之见。延安前期的文学批评也是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基本组成部分, 而且正是由这一阶段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所引发的问题与得出的经验, 才促使延安后期文艺活动的一系列重大的形式变革与制度设计的产生, 可以说这一过程暗含着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与必然性。

延安前期的文学批评还是呈现出很强的泛审美化倾向, 追求美学自主性, 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者说, 延安前期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准体制性”的文艺制度建构。从总体上来看, 延安前期的文学批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在批评内容上, 包括了对文学理论、文学运动以及文学创作的批评, 涉及文艺实践活动的所有环节和全部领域; 在批评的组织实践上, 是围绕着以文人为主体的文艺社团而展开的, 呈现出“泛组织化”的特征; 在批评的标准上, 具有一种和抗日战争语境中的政治实践双向平衡并发生互动关系的态势, 这种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中促进了文艺生产的多元化趋向, 但也部分地造成了文化战线与其他战线的步调产生了紊乱, 这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 1942 年 5 月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开展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重要原因。

周扬的文学批评实践贯穿了延安文艺的整个发展过程, 他也是我们观察延安前期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必须要解读的重要批评家。周扬的身份是多元的, 他既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领导者之一, 也从事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 并以其高超的文艺理论素养与批评实践能力而很

快成为延安文学批评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不断地将苏联的文艺理论向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介绍。抗战爆发之初, 周扬认为: “车尔尼雪夫斯基达到了现实之教育的意义和作为‘人生教科书’的艺术之教育的意义的理解, 这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的源泉。”^{[2](197)}正是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著作的批评解读中, 他将苏联具有革命性质的文艺理论汲取到延安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中, 并特别指出: “继承这份宝贵的理论遗产, 在民主革命的阶段的中国, 从这位‘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我们可以学习到也许比从现代批评家更多的东西。”^{[2](197)}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周扬介绍的侧重点是在战时语境中对民族意识形态的关注。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 周扬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美学思想进行了解读, 与前一次相比, 这一次的介绍却展现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关注点。周扬写道: “他肯定推翻剥削者的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 信奉唯物主义的思想。”^{[3](367)}同时, 他明确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高原则”, 那就是“坚持艺术必须和现实密切地结合, 艺术必须为人民的利益服务”^{[3](379)}。从抗战初期的宏观推广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对人民性话语的确认, 可以看到周扬在不同阶段的延安文学批评实践中对苏联文艺理论资源征用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经历了从美学上的普泛化介绍到政治上的现实性确认的变化。

在延安前期的文学批评的对象选择上, 对五四新文学特别是对鲁迅的评价与阐释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延安时期的一系列公开讲话中, 毛泽东界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与革命史上的独特地位, 毛泽东对鲁迅地位的明确定位带动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持续性纪念与综合性阐释。在 1937 年 10 月 19 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 毛泽东认为, “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及“牺牲精神”综合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4](10)}。从此以后, 鲁迅逐渐被确立为延安前期文艺活动的“文学旗手”之一, 在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文化诉求, 并不断被延安文艺工作者纪念与阐释。在延安前

期关于鲁迅的纪念、评论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还有艾思奇的《学习鲁迅主义》(《文艺突击》1938年第1期)、陈荒煤的《老头子》(《文艺突击》1938年第1期)、肖三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10月20日)、胡蛮的《鲁迅对于民族文化和艺术问题的意见》(《中国文化》1940年第1期)、茅盾的《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大众文艺》1940年第5期)、丁玲的《“开会”之于鲁迅》(《大众文艺》1940年第5期)、郁文的《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志》(《新中华报》1940年11月7日)、何干之的《中国和国人的镜子》(《鲁迅研究丛刊》1941年第1辑)、魏东明的《鲁迅创作的道路》(《鲁迅研究丛刊》1941年第1辑)等。总体来看,这些评论文章大多是从延安文艺发展的现实境遇出发来表达对鲁迅的怀念,在追忆的同时也反映出文艺工作者对当时文艺发展路向的不同解读。延安文艺发展中对文学旗手的确立、对经典作家的评论很大程度上处在一种寻找与建构共识的过程中,这种共识只有到延安后期随着延安文艺制度建构完成才获得了普遍接受。

延安前期文学批评的泛审美化倾向还体现在对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相关问题的讨论与批评上。1938年开始于解放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影响最大。这场讨论起源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的发表,诸多文艺工作者如艾思奇、柯仲平、沙汀、周扬、茅盾、徐懋庸、何其芳等人围绕“旧形式利用”“怎样创造文艺的民族形式”等问题展开讨论。参与讨论者大多能从抗战现实的文艺实践出发,突显了一种民族意识的勃发。尽管这次讨论存在着脱离文学创作实际的问题,但对明确延安文艺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

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关于“三民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口号的讨论,是在“民族形式”讨论之外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抗敌报》主编邓拓在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召开的创作问题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个口号,他认为:“这一新口号的提出,它和过去各种文学的口号不同;它不同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

文学’,这两个口号各都有其缺点,不能团结全民族一切阶级阶层的作家,不适于中国抗战建国的现阶段的新形势。”^{[5](10)}关于“三民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口号的批评文章集中在晋察冀边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为了探索抗战文艺的发展方向而作出的努力。但缺点在于,随着抗战形势与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口号已经不能适应延安文艺的发展形势,所以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便取代了这一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者对于文艺发展方向的短暂提法。

延安前期关于文艺发展的理论探讨与文学论争值得注意的还有白朗、艾青、舒群、罗烽、萧军等人关于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18、19日)一文的讨论。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文艺月报》1941年第8期)一文。与此相似的还有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评价问题的讨论。欧阳山在《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中认为,小资产阶级作家自抗战以来“或者落伍,或者沉默,或者冷淡”,“有些变成了暧昧的浪漫主义者,甚至连批判能力都没有了的现实主义者”^[6]。欧阳山的这一稍显片面的说法很快遭到了林昭的反驳,林昭认为:“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不但没有‘落伍’‘沉默’和‘冷淡’,而且是在抗战的巨流中变得更前进更坚强了。在他们的笔下许多优秀的作品不断产生,这事实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据。”^[7]这次讨论和关于《文学与生活漫谈》的讨论虽然都没有进一步深入,但却有效地突显了延安前期文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丰富了延安文学批评的内容与形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与延安后期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不同的是,延安前期文学批评处在一种因追求泛审美性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中。这是因为这一阶段“文艺政策的建构是相当松散的,并没有形成作为文艺政策中心的政党意识形态话语”^[8],当文艺政策处于一种“泛政策化”状态时,文学批评也就受此影响而显得组织性并不是很强并且呈

现出相对自由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不重视文学批评,周扬从上海回到延安后,一直极力倡导和推动着延安前期的文学批评工作。在抗战初期,他就提出“要建立抗战时期的文艺批评”。同时,他也认为:“在抗战期文艺运动的推进上,批评负了很大的重负。……批评应当把作品活动引导到正当的方向,它应当成为抗战时期文学运动的引路者,只有健全的批评的建立,才能把文学上抗敌救亡的任务很好地完成。”^[9]这种对文学批评工作的研究与引导一直贯穿于他以后的文艺主张中。在《我们的态度》中,他指出延安文学“作品落后于现实,理论批评又落后于作品”的现状,并提出了批评家的修养问题。他认为:“修养的问题在今天对于理论家比对于作家更为重要。批评家在修养上应当比一个作家更高。因为批评家不但要能够虚心地向作家学习,同时还要做某种意义上的作家的教师。”^[10]周扬及其他文学批评工作者的努力,不仅促进了延安的文学创作,也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做了很重要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的铺垫工作。

总体来看,延安前期的文学批评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平衡状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文学批评也与文学创作实践产生了较为平等的对话关系,契合了抗战背景下延安文艺的发展形势,呈现出一种“准体制性”的批评话语建构态势。

二、“以大众为中心”:延安后期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

延安前期的文艺发展呈现出一种“泛审美化”倾向,文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保持着并行不悖的共同发展的方向,文学批评基本围绕着文学创作活动展开,有着相对自由的发展状态,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标准,“泛审美化”是延安前期文学批评的基本诉求。延安前期文艺运动的特殊性与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在全国革命中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与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在当时的革命力量持续性增长有着密切的关联。毛泽东

的《讲话》既基于他个人对延安文艺发展状况的观察,也是延安文艺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讲话》中提到“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11](72)},这个论断对延安后期文学批评的开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文学批评在整个文艺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讲话》特别强调:“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11](73)}《讲话》对文学批评的两种标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规定性阐释与对“政治标准”的优先级排序,都显示出文学批评在文艺运动中的重要性。紧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12]《讲话》既是一般的文艺理论,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文艺政策。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确立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延安后期的文学批评变成了对《讲话》的政策阐释,以及对延安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引导。“以大众为中心”既规定了开展文学批评的基本对象,也强调了文学批评主体的无产阶级立场,延安后期的文学批评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活动,而是包含了意识形态属性的“人民性”话语实践。

观察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周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文艺观点的变化,或许更能理解《讲话》在延安文艺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及带给我们的历史经验。在延安的文化政治场域中,人民性是一个具有融合性内涵的概念,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结果。《讲话》确立的文学批评标准突显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根基:以大众为中心。周扬曾在1941年发表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中表达了他对延安文艺创作题材、创作自由的观点:“自然,过去的题材也是可以而且应该写的。一定要选取

反映边区八路军或至少有关抗战的题材,这虽是一种可尊重的责任感觉,却可以反转成一种对于创作的限制的。在题材、样式、手法等等上必须容许最广泛的范围。在延安,创作自由的口号应当变成一种实际。”^{[13](337)}这种具有一定包容性的文学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延安文化政治场域中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因为延安前期文艺发展的主导力量是知识分子作家个人。但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随着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组织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结束,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全面展开,延安后期文艺活动的现实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切作家的文艺活动真正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工作战线之中,以作家及其作品阐释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成为建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有效路径,延安后期的文学批评实践与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一种以表达意识形态关怀为目的的“强”互动关系。1947年,晋察冀边区召开文艺座谈会,根据这次座谈会的讨论结果,晋察冀边区中央局作了关于开展文艺创作、乡村文艺运动、部队文艺工作的三个决定。周扬在这次座谈会上谈到创作题材时认为:“主题是确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而且只能写与工农兵群众的斗争有关的主题。”^{[14](501)}这与他之前提倡的写作题材上的多元与创作上的自由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别,但这也正是《讲话》所发生效用的体现之一。周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他的观点始终试图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所以这种转变其实是顺理成章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延安后期的文学批评在范围与原则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更加集中在对毛泽东的《讲话》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政策阐释上,如刘白羽的《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等。周扬在文章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

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15]可以说,这是对《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范本的最好确认。艾青在《秧歌剧的形式》(《解放日报》1944年6月28日)中对秧歌剧创作的理论探索也是对毛泽东的《讲话》的积极响应。这些都是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讲话》的主动解读。

在文艺活动的批评方面,更加集中在对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内部知识分子作家深入基层展开文艺活动的倡导,以及对解放区群众文艺创作活动的强烈关注。艾青的《展开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解放日报》1942年9月27日)与周扬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街头诗”运动与“新秧歌”运动的蓬勃发展,便是文艺活动的有效组织与文学批评的广泛开展共同推动而促成的。

在文学创作批评方面,更加集中于对解放区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关注上,这一部分的成果也最为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对丁玲、孔厥、赵树理、柳青等作家创作的评论文章,如燎荧的《“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底〈在医院中时〉》(《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周扬的《略谈孔厥的小说》(《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4日)、《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关于政策与艺术——〈同志,你走错了路〉序言》(《解放日报》1945年6月2日)、《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贺敬之的《〈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白毛女》新华书店1946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东北日报》1948年5月29日),茅盾的《关于〈吕梁英雄传〉》(《中华论坛》1946年第1期),赵树理的《介绍一本好小说——〈高干大〉》(《人民日报》1948年10月7日),郭沫若的《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北方杂志》1946年第1—2期),陆定一的《读了一首诗》(《解放日报》1946年9月28日),等等。这些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对延安作家们的文学创作进行引导与鼓励、对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读者进行阅读引

领与建构共识的作用,也在后来为延安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方面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文学批评工作的重视与倡导促成了文艺活动的极大繁荣,正因为对《讲话》进行的意识形态阐释,从而使延安后期的文学批评成为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有效力量。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延安文艺活动开始大规模的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随着大量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与部队基层,延安后期文学批评也有了很强的政策性,为延安文学建构以大众为中心的人民性话语提供了体制性保障。延安后期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是契合当时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内外部的现实要求的,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中实现了对文艺政策的有效贯彻,从而对以延安为主体的整个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产生了带动、鼓励以及引导作用,为解放区的军民团结与政权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上的文化保障与发展标准。延安后期的大批经典性大众化文艺作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解放区特定的历史语境规范,促使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逐渐从前期的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文本解读过渡到后期的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标准的政策阐释。正是在延安文学批评话语的体制性转型过程中,文学批评才得以成为延安文艺制度的建构力量。

三、超越艺术审美:延安文学批评对意识形态的传导

在延安时期的文化语境和历史场域中,文学批评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审美活动,而是一种针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阐释行为。或者说,在延安文学的话语系统中,文学批评扮演着意识形态传导者的角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学批评已经成功转化为延安文艺体制的建构路径。

作为延安文艺体制的构成要素,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不再是采取纯粹的美学价值判断的方式,而是逐渐形成了一种运动式批评机制,如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批评、对“演大戏”问题的讨论、对“艺术至上主义倾向”的批判、围绕《腊

月二十一》《丽萍的烦恼》《叹息三章》《纺车的力量》《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等作品的批评实践以及关于“赵树理方向”的讨论等,都是这一批评机制逐渐形成的较为鲜明的体现。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的发表时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不久,但他的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强烈讽刺态度以及背后反映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受到了大多数文艺领域的领导者以及部分文艺工作者的批评,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很快就有一场针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运动式批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内逐渐确立了一种运动型治理机制,“运动型治理机制的最大特点是,暂时叫停原科层制常规过程,以政治动员过程替代之,以便超越科层制度的组织失败,达到纠偏、规范边界的意图”^{[16](150)}。结合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凡是影响到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思想观念,都被文艺领域的领导者视为可以进行运动式治理的对象,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批评过程与对“赵树理方向”的确立过程在本质上都可以归属于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机制。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在地理空间上的迅速扩大与文化空间上的极度扩张,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到来,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政治意识形态就走向一条超越民族性、建构人民性的能动性历史实践之路。文学批评一直是作为意识形态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并发挥着规训和引导的作用。

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分界点,延安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批评空间上表现为批评范围的缩小与集中态势,批评对象上逐渐显现出一种批评主潮的嬗变与融合特征,批评的关键问题上则形成了对人民性批评标准的重构与确立。1942年9月,《解放日报》的全面改版是这一转型开始的体现之一。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为了进一步推进《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方向,毛泽东希望《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17](392)},同时他亲自为《解放日报》的改版拟定了征稿办法,指定周扬为文学批评部分的征稿负责人,每月要求10 000字,并提出要求:“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

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18](99)}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推动文艺发展新方向的积极姿态以及对文学批评工作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到,当《讲话》对文学批评标准进行了明确界定后,文学批评作为传导延安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政治意识形态中心话语“人民性”的重要路径,通过具体展开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就成为意识形态传导机制的重要问题。

在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运动式批评完全展开之时,我们不能忽略当时“根据地处于敌人包围的困难情势”^{[19](76)}之中,所以在反思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批评活动时要结合特殊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不能单纯从艺术观点出发,那样会陷入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认知危机中。在齐肃、杨维哲、金灿然等人分别发表了对王实味的批评文章后,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使这场批评活动达到了高潮。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角度来看,作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运动式批评,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统一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整个文艺工作的引导与规范,为当时延安的内外部斗争实践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在这场批评活动中,其他作家也作了自我批评,如曾任《解放日报》文艺栏目主编的丁玲就对《野百合花》的发表进行了检讨,认为自己“只站在一个普通的编者的立场(非党报或党员)去决定稿件的取舍,而对于自由论争的理解不够,和政治的幼稚”^[20]。

在整个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周扬作为延安文艺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也带头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批评与对鲁艺教育的批评是较具代表性的。在批评王实味文艺思想的过程中,周扬从王实味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中提出的三个问题着手,一方面展开了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批评,另一方面也阐明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负责人的文艺观点。周扬认为,王实味“狡黠地”捕捉了当时文艺上的三个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所谓人性的问题;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抑应写黑暗的问题”,而

“这些问题都是文艺上的根本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在今天的延安有着迫切的意义”^[21]。周扬的批评文章在所有针对王实味的批评中是较为客观的。在1984年出版的《周扬文集》中,周扬本人在这篇文章后面写了作者附记,在说明了文章写作的背景后,他写道:“我写这篇文章,着重从文艺理论方面分析批判王实味的错误观点。”^{[22](405)}正如周扬自述的那样,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的那场针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大规模、有秩序的批评运动中,他的批评文章是较具学理性的,这和他本人有着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及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这篇文章从批评王实味文艺思想出发但又不止于此,它的真正贡献在于作者对当时延安文艺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进行了一次具体的理论探讨与逻辑分析。这当然也得益于周扬对《讲话》的继承与发展。

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周扬对“关门提高”的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反思,他认为,“鲁艺自身需要一个改造”,“如何把鲁艺整个艺术教学活动建立在与客观实际的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上,这就是改造鲁艺的首要的、中心的问题”^[23]。周扬是延安文学批评转型中的重要文艺工作者与批评家,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从批评实践,他都能提出建设性的反思与措施,比如对于鲁迅艺术学院的改造,他提出了八点改进的具体方法,涉及与兄弟单位的联系、实习工作的推进、理论研究方法的改变等。随着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文学批评与政治意识形态得到了有效的结合,正如学者钱理群所说:“《讲话》不是单纯的文艺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党的意识形态。”^{[24](518)}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延安文学批评的转型过程与延安文艺制度的建构过程基本保持一致,有效传导了以大众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运动式批评机制的建立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机制的雏形。

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从前期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泛审美化”文本解读发展到后期的以《讲话》为根本的文艺政策阐释,其实质是中国

共产党探寻以人民性为基础的审美意识形态话语的建立,其目标是确立文学批评在延安文艺体制中的意识形态属性。这都为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学创作是一项复杂的话语实践活动,人民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文学批评不是单纯的审美鉴赏活动,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实施相伴而生的审美意识形成过程^[25]。在延安文艺的发展进程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毛泽东《讲话》的发表都促成了延安的文艺政策、文艺社团以及文学批评的重大重构,而文学批评的转型又推动着延安后期的文艺活动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运动。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最终完成,既为延安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也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重大历史实践中起到了文化上的指引与宣传上的动员作用,这也是我们今天反思延安文艺最应该把握的地方。作为延安文艺体制构成要素的文学批评,在转型过程中非常注重优化文学批评的组织能力,同时也要求提升文学批评家的学术修养与艺术美感。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工作者所特有的现实关怀意识及其深入群众的社会实践能力,也是值得今天的文艺工作者认真借鉴的,而文艺领域的领导者对文学批评的规范性引导,也使得文学批评在延安文艺制度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延安时期文学批评转型与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互动发展的历史经验,不仅贯穿于延安文艺的发展过程之中,而且有值得借鉴之处。当下的文学批评之用也应该汲取延安文学批评的历史经验,激活并传导那些来自历史经验深处的文化营养。

参考文献:

- [1] 陈思和. 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J]. 文学评论, 2021(3): 38-47.
- [2] 周扬. 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C]//周扬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3] 周扬. 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C]//周扬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4] 毛泽东. 论鲁迅[C]//毛泽东文艺论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5] 邓拓. 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诸问题——在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C]//刘增杰,等.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中.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 [6] 欧阳山. 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J]. 中国文化, 1941(2-3): 4-16.
- [7] 林昭. 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N]. 解放日报, 1942-01-27(4).
- [8] 郭国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与延安文艺政策的确立[J]. 中共党史研究, 2014(12): 26-37.
- [9] 周扬. 抗战时期的文学[J]. 自由中国, 1938(1): 6-13.
- [10] 周扬. 我们的态度[J]. 文艺战线, 1939(1): 1-3.
- [11]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C]//毛泽东文艺论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N]. 解放日报, 1943-11-08(1).
- [13] 周扬. 文学与生活漫谈[C]//周扬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4] 周扬. 谈文艺问题[C]//周扬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5] 周扬.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N]. 解放日报, 1944-04-11(4).
- [16] 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 [17] 艾克恩.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 [18] 毛泽东.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C]//毛泽东文艺论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19] 刘增杰. 中国解放区文学史[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 [20] 丁玲.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N]. 解放日报, 1942-06-16(4).
- [21] 周扬. 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N]. 解放日报, 1942-07-28-29(4).
- [22] 周扬. 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作者附记)[C]//周扬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23] 周扬. 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N]. 解放日报, 1944-09-09(4).
- [24] 钱理群.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政治文化意义[C]//王德威.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台北:麦田出版社, 2021.
- [25] 颜水生. 文学史话语的历史诗学论纲[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7(5): 166-174.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stem of Yan'an Period

GUO Guochang, XIE Tengf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is one of the basic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stem. Taking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as the dividing lin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Yan'an period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text interpretation centered on writers' works in the early stage to a policy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Mao Tse-tung's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at the late stage. It is in this very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Yan'an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that literary criticism could become the constructing force of Yan'an literary and art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Yan'an period is actual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PC's exploration of the people's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and art practice in Yan'a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policies of the CPC jointly constitute an ideologic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the people's position is also constructed in this mechanism as an aesthetic ideology.

Key Words: Yan'an period; literary criticism; people's position; ideology;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stem

[编辑: 胡兴华]

(上接第 157 页)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enerating paths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situation-resource-strategy framework

GAO Shan^{1,2}, FANG Jia¹, ZHANG Ye¹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7

2.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Abstract: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Based on literature comb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ituation-resource-strategy" analysis framework, use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in 31 provinces in China,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eneration paths of local govern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digital 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four ways to achieve high-level digital 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namely, situation-strategy, situation-led, strategy-drive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ata openness is the core condition in the four paths, and it has become the "key technical fulcrum" of local govern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digitalization. Situational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 four paths, and with accountability pressure and disaster pressure being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urn external pressure into internal driving in the future. In the cross-case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dopt proactive action strategie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allocation of policy attention, which can make up for the innate lack of objective endowments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regions.

Key Words: emergency management; digital technology; data openness; policy-driven; configure the path

[编辑: 游玉佩]